

晋察冀抗日根据地——

# 发动群众打好平原游击战

■ 贾卢彬 李梦蝶 周一

1937年10月23日，聂荣臻率领八路军第115师一部、第120师一部及八路军总部的部分人员，进入晋察冀边界地区，开展宣传发动群众、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。11月7日，中共中央指示成立晋察冀军区，由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，以五台山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。11月18日，为使指挥机关处于适中位置，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由五台迁驻河北阜平县城。不久，晋察冀省委在阜平正式成立。各地区党的特委和县以下组织也先后建立起来。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建立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华北抗日战场的局势，并逐渐成为我党、我军在华北地区坚持抗战的重要战略基地。同时，这支以第115师留在五台地区部队为主组建的抗日武装，也逐渐发展成为一支英勇善战、功勋卓著的雄师劲旅。

## 率先建立抗日民主政权

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立不久，华北重镇太原沦陷。作为正面战场主力的国民党军迅速南撤，侵华日军则乘势进攻，占据黄河以北的大片领土。随后，毛泽东同志在《关于坚持华北游击战争的指示》中明确提出：“山西各军大撤，除刘湘、汤恩伯外，暂时均不能作战。正规战争结束，剩下的只是红军为主的游击战争了。”更为严重的是，国民党军的仓皇撤退，引起当地国民政府各级机关人员的恐慌，他们也纷纷逃离华北，一度造成该地区的权力真空。一时间，土匪、流氓、会道门等趁机蜂起，人民群众的苦难不堪言。

聂荣臻率晋察冀军区到阜平前就考虑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，除发展武装力量外，还应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。国民党的旧政权垮了，只有建立起新的抗日民主政权，才能安定人心，如同竖起一面大旗，使人民群众和各种抗日力量聚集在这面大旗之下。经请示中央批准，他一到阜平就与五台县县长宋劭文、孟县县长胡仁奎以及冀察两省的有关人士座谈，商量成立全区政权机构问题。12月5日，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筹备处在河北阜平成立，迈出了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第一步。1938年1月，在经过1个多月筹备后，晋察冀边区军政代表大会在阜平隆重召开。这次会议，共有140余名参会代表，其中不仅有共产党、国民党、各抗日武装、各抗日阶层的代表，也有少数民族代表、国民党旧政府的代表，甚至有五台山的和尚、喇嘛等宗教界代表。会议期间，代表们本着团结一心、共同抗日的原则，共商抗日救国大计，并最终通过涉及晋察冀边区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财政等各项议案，并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。



晋察冀八路军粉碎日军围攻之后，以铁骑突破平型关，长驱出击。资料照片

临时行政委员会的产生，标志着晋察冀边区有了统一的政府机关，人民群众有了可以依靠的政权保障。更为重要的是，这次选举活动是由我党发起，边区各界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，它极大提振了边区军民团结一致、抵抗侵略的信心和斗志。1月底，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，行政委员会取消“临时”的名称，开始正式全面地行使政权职能。有了这次成功尝试，边区的基层群众也受到教育和鼓舞，在随后的基层政权建设过程中，晋察冀边区先后有8000余个村根据行政委员会的命令举行了民主选举，把民主政权建设落实到了末端。

## 大力建设抗日武装力量

1937年10月，由于第115师主力奉命南下，由聂荣臻率领，继续在晋察冀边区坚持斗争的剩余力量只有2000余人。之后，通过两年多动员人民群众参军和收编各种武装，到1939年底，晋察冀军区编制的主力部队就有9.4万余人，是成立之初的数十倍之多，战斗力大为增强。

除了主力部队外，晋察冀军区在地方武装的建设方面也卓有成效。当时，在军区的统一部署下，根据地各村年满16岁、不足55岁的男女村民都被纳入抗日自卫队当中。起初，抗日自卫队的队员并不完全脱离生产，只执行传递情报、站岗放哨、打扫战场等任务，使用的武器装备也主要是一些就便器材，如长矛、锄头、大刀等。随着战事发展，在自卫队当中逐渐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战斗队员，积极分子，各地遂依托他们组建起由党员领导的基于自卫队和青年抗日先锋队，统称民兵，成为晋察冀边区精干强悍的游击组织。

1939年9月，为进一步增强抗日武装力量，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颁布《边

区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暂行组织条例》，正式提出建设“百万民兵”的号召。与此同时，根据地人民群众也积极参加八路军，各地广泛出现“母亲送儿上战场，妻子送郎打东洋”的动人场景，并涌现出如平山团、阜平营等以新兵入伍地命名的作战单位。聂荣臻司令员大为感动，给他们起名为“子弟兵”，这一称谓很快家喻户晓，也在无形中密切了军民关系，增进了根据地的军民团结。

## 敌进我进，到敌后之敌后去

从地形上看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与晋冀豫、晋西北、山东抗日根据地等有很大不同，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是这里以平原为主，这也是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一个劣势。因为在平原地区，敌军容易发挥机动性强、火力强的优势，不利于我军分割包围敌人、打运动战歼灭战。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，敌人在晋察冀一带逐步展开“扫荡”和“蚕食”，破坏我根据地建设，残害我根据地军民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入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。1942年9月11日，晋察冀分局和军区在平山县寨北村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，学习贯彻党中央关于开展“敌进我进”斗争的指示，并明确提出了要“到敌后之敌后去”的口号，把武装斗争作为对敌斗争的核心内容。这次重要的会议被称为北寨会议，其所确定的对敌武装斗争方针，成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平原游击战的重要指导原则。

“到敌后之敌后去”，关键有两点：一是怎么突破敌人的封锁线，二是突破之

后如何在敌后站稳脚跟。在前一阶段的斗争当中，根据地也曾有部分武装力量做过这方面尝试，但大都以失败告终。北寨会议之后，各部队针对各自情况，精心准备并展开实际工作。首先，组建坚强的武装工作队，即武工队。深入敌后的作战行动，是对战斗人员军事素质与心理素质的双重考验。根据地在组建武工队的过程中，将主力部队中的优秀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结合起来，组成坚强的党支部，同时兼顾战斗任务和地方工作。随后，在群众的帮助下通过敌人的封锁沟。敌人为了加强“蚕食”，在根据地周边地区挖掘了纵横密布的封锁沟，通常宽4至9米、深5米，并布设大量的地雷、铁丝网等障碍物，妄图通过这种方式将军民困死在根据地里面。在得知武工队要过封锁沟时，大量曾经被迫参与过“挖沟”的群众主动联系部队，不仅把地雷埋设的具体位置全部标出，还冒着生命危险帮武工队架梯子、捆绳索，帮助他们通过封锁沟。

在越过封锁沟之后，武工队充分发挥群众工作的优势，与敌占区的群众建立了密切的关系。在被敌人“蚕食”不久的村庄里，党的地下组织和民主政权并未被完全破坏，武工队遂依托这些组织重建秩序、开展工作。在一些被敌人破坏比较严重的地区，地主、汉奸势力活动猖獗。武工队一面向群众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，一面严惩欺压群众、助日作恶的反动分子，增强群众坚持抗战的信心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，不仅普通群众大力支持武工队，就连那些被日军蛊惑收买、答应为日军传递情报的“联络员”也主动向我军示好，帮助我军向敌人传递假情报，从敌人的耳目变成了我军的耳目。在群众的拥护和配合下，武工队和其他武装力量不仅在敌后站稳了脚跟，还积极作战、打击敌军，消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，并在敌后建立起众多小块的游击根据地，成为我军积蓄力量、准备反攻的重要基础。

毛泽东同志在《论联合政府》中指出：“人民是最好的鉴定人，他们知道八路军新四军这时数量虽少，质量却很高，只有它才能进行真正的人民战争，它一旦开到抗日的前线，和那里的广大人民相结合，其前途是无限的。”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就是一个典型代表，从创建之初的2000余人，经过坚持斗争和不断发展，不仅在抗战期间累计向其他根据地输送了33个整建团和25个团架子，而且在抗战结束时建成一支拥有32万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、90余万民兵的强大武装力量，创造了许多如地雷战、地道战、麻雀战等精彩的游击战法，是屹立于华北敌后的坚强抗战堡垒。



## 伟大胜利的战略基地



新四军第4支队旧址纪念馆坐落在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高峰乡东港村韦家大屋。韦家大屋曾是舒城大族韦氏的老宅，当年新四军第4支队来到舒城，韦氏家族把这座老宅腾出给第4支队作为司令部办公地点。

资料照片

1938年4月上旬，遵照党中央关于“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、徐州、合肥三点之间作战”的指示和新四军军部关于东进皖中、皖东的命令，新四军第4支队开始向皖中挺进。4月中旬，第4支队抵达皖中敌后，展开于庐江、无为、舒城、桐城和巢县（今巢湖市）地区，和中共皖中地方组织一起发动群众，积极开展游击战争，配合正面战场作战。

皖中的舒城、桐城等地，是日军西犯武汉的必经之路。6月，日军先后攻占舒城、桐城、潜山、怀宁、安庆等地，并

继续向六安、霍山等地进攻。为钳制西犯之敌，配合武汉会战，第4支队主力大部推进至安（庆）合（肥）、合（肥）六（安）公路两侧，伏击、袭击日军汽车运输队，破坏日军补给线。其中，第4支队第7团1营负责在安合公路舒城地段偷袭日军。

10月9日，第4支队第7团1营奉命从舒城西南部的中梅河出发，向舒（城）六（安）公路上的椿树岗一带运动，伺机伏击日军。经过几小时急行军，部队抵达椿树岗后迅速侦察地形，发现公路东侧有一条250米左右长、1米多深的干

# 椿树岗伏击战

■ 胡遵远 郑贤杰

沟，非常便于我军设伏，并且沟东面一路缓坡上去有一块高地，是一个很好的制高点。营首长立即令2连迅速占领高地，向北警戒，隐蔽在公路东侧；1连、3连埋伏在椿树岗集上几堵断墙残垣下面，准备伏击日军汽车。

部队刚刚布置就绪，东南方向就随隐约传来汽车的马达声。营首长派人登上高地瞭望，经观察判断，确定是日军的汽车运输队，正缓慢地向伏击地域驶来。

营首长当机立断，决心伏击敌军车队尾部。官兵迅速按照命令依托公路东侧的干沟、山坡等有利地形和夜暗条件各就各位，做好战斗准备。

夜幕降临，开着车灯的敌军车队驶入我军伏击圈。当敌军车队尾部进入伏击圈后，负责发出战斗信号的2连指导员张本科将驳壳枪对准敌车，“啪！啪！”连发两枪。霎时间，全营火力集中射向敌人，手榴弹一颗接一颗地飞向敌军车辆，爆炸燃起的熊熊烈火照亮了夜空。

先头过去的几辆敌军汽车妄图掉头增援，被早已占领公路东侧制高点的2连官兵以密集火力阻击。由于不明我军虚实，加之道路狭窄，敌军车辆无法掉头，不得不仓皇逃窜。



## 中国古代兵器面面观

在攻城作战中，守城方可以凭借高大坚固的城墙，居高临下，以逸待劳地进行防守，攻城方从下往上进攻，往往处于劣势。为扭转这种不利局面并提升攻城效率，古人研制出多种高层塔楼类攻城器械。这些器械大致可以分为两类：一类主要用于侦察瞭望敌情，如巢车、望楼车、望杆车等；另一类则主要用于攻城，其利用自身高度，能够帮助士兵登顶城墙或直接作为攻击平台对城墙发动攻击，如临车、吕公车等。本文简要介绍几种典型的高层塔楼类攻城器械。

巢车是中国古代一种设有望楼（即可悬于高处的小型木质板屋，四面设有望孔可供观察），用以登高观察敌情的车辆，因车上高悬的望楼如鸟之巢，因此得名。据唐朝杜佑《通典》记载，巢车底座安装8个车轮，车上竖立2根木柱。木柱上端设有类似滑轮装置的轱辘，可以很方便地用绳子把板屋系在轱辘上进行升降。板屋一般宽4尺、高5尺，可容纳1至2人。板屋四面设有瞭望孔，外覆生牛皮以抵御敌人矢石的攻击。最早使用巢车的记载见于《左传》。公元前575年，晋楚两军战于郟陵。决战前，楚共王曾在太宰伯州犁陪同下，登上巢车观察晋军虚实。

望楼车和巢车同属侦察瞭望攻城器械，成熟于宋朝。望楼车车体也为木质，底座装有4个车轮，车上的竖杆上端固定一间边长5尺左右的方形板屋，其内部可容纳1名士兵。竖杆下端配备转轴装置，使板屋可四面旋转观察。为增强稳定性，车体通过6条绳索斜拉固定。竖杆表面设有供攀爬的脚踏板，士兵可借此攀登至板屋。望楼车比巢车高大，观察视野更加开阔，其功能相当于后来用来观察敌情的瞭望塔。

明朝时期出现了一种新型随军瞭望车——望杆车。这种车底座较大，车上竖立1根大木柱，木柱上设皮制望斗，士兵可在里面瞭望敌情。相比宋朝望楼车只用于观察瞭望，该车底座的前侧还设有挡板和外伸枪，不仅防护性能更好，还具备一定的对敌冲击功能。

临车和吕公车皆为以攻击功能为主的攻城器械，且二者形制结构均是以下车为底、上筑高层木质塔楼。其中，临车出现时间较早。《诗经·大雅·皇矣》有云：“与尔临冲，以伐崇墉”，临即临车。临车为高层可移动塔楼式结构，在车座上以木建高台，士兵可登上高台，对城上敌军发动攻击，也可通过高台直接攻城。春秋战国时期，临车常与冲车配合使用，形成“临冲”战术组合，极大提升了攻城作战效能。

吕公车是宋朝出现的一种巨型攻城战车。据《武经总要》记载，吕公车高数丈，长数十丈，车内外分上下5层，每层有梯子可供上下，车中可载几百名士兵，配有弩箭、枪戟、刀矛等武器和破坏城墙设施的器械。攻城时，士兵将车推到城墙脚，车顶可与城墙平齐，士兵可冲到城上与守敌拼杀，车下面的士兵可用撞木等工具破坏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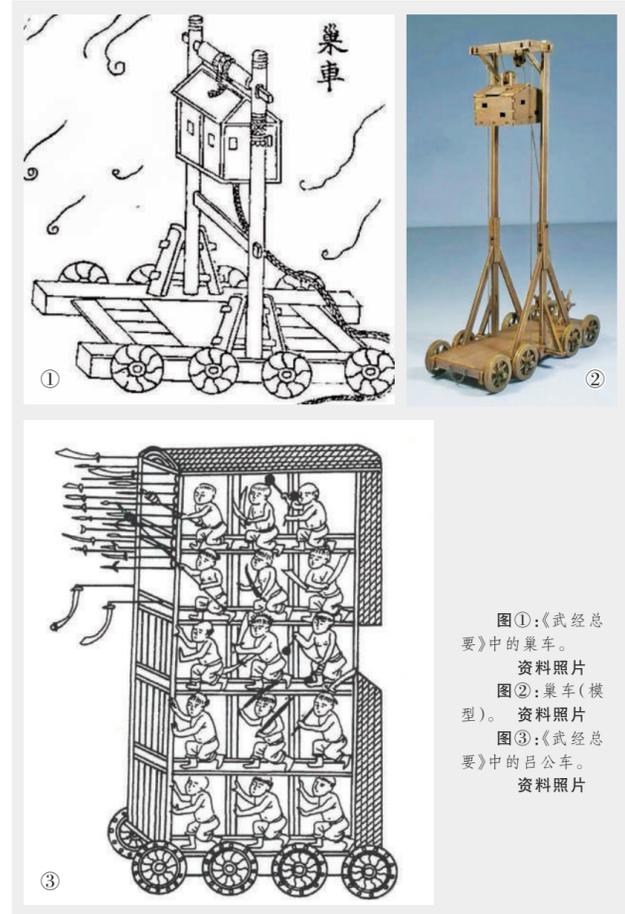
# 倚木登高破敌营

——中国古代高层塔楼类攻城器械

■ 曹波

墙。吕公车在明朝时期有较多应用。公元1621年，明熹宗派朱燮元守备成都，平息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的叛乱。叛军围困成都期间，不仅架设云梯试图攀爬城墙，还在城外修筑土山、构筑工事，利用居高临下的优势以强弩攻击城上守军。守军依托城墙顽强抵抗，战局陷入僵持。一天，城外突然喊声震天。守军发现远处有数十头牛牵引着一座庞然大物的战车缓缓逼近，车体内部暗藏数百名弓箭手蓄势待发。当战车靠近城墙时，突然箭矢齐发，再往前抵近城墙时，叛军开始登城，守军一时惊慌失措。朱燮元当即识破这是传说中的吕公车，沉着指挥守军进行反击，用石弹轰击车体，同时以火攻惊散拉车的牛群。牛群受惊奔逃导致战车失控，车中叛军纷纷坠地，溃不成军。巨大的吕公车虽然威力惊人，但受限于笨重的体形和复杂的地形，更适合用于攻打防御薄弱的小型城池。当面对防御坚固的城池时，只要守军沉着应战，灵活运用守城器械，并配合火攻等手段，就能克制这种攻城器械。

明朝以后，随着火器普及，各类木质攻城器械因无法抵御火炮攻击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



图①：《武经总要》中的巢车。资料照片  
图②：巢车（模型）。资料照片  
图③：《武经总要》中的吕公车。资料照片

## 链接历史